



作家要回应时代和社会重大关切

□ 梁鸿鹰

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，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堪称宏大的独特实践创新。别林斯基曾经说过：“一个诗人越是崇高，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，他才能的发展、倾向、甚至特点，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。”在这个急遽变革的时代，有很多深刻、丰富和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家关注。直面当下中国百姓的生存现实，抓住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，让时代课题在创作中得到最生动的呈现，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担当。

文学要在时代的现场

不管是文学，还是其他艺术形式，都需要创作者非凡的才华，但仅有才华肯定是不够的。能否保持回应重大社会问题关切的热情，能否拥有对民众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探求的好奇，特别是，能否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艺术审视与把握，能否把自己的创作放在时代大格局中予以考量，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生命力。作家只有在生活中扎得深，才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馈。回首新时期喷涌而出的文学名篇《班主任》《爱是不能忘记的》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以及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《大雁情》等，就很好地诠释了作家与时代生活现场的血肉联系。这些作品被争相传看，成为持久的街谈巷议，对社会产生风成化习的影响，是很自然的。如不少文学编辑抱怨的那样，现在长篇小说能够印一万册就算不错，这里面有纸媒衰落、阅读分众等客观原因。但反观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，也会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原因。如果文学无关老百姓的生活痛痒，不触及当代社会的敏感神经，不回答生活向作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，换句话说，作家如果不在文学现场，不在人生现场，甚至不在生活现场，写出来的作品注定苍白而渺小，不会引起社会普遍共鸣，即使在文学圈子里热闹一阵子，也会很快成为明日黄花，沦为速朽的样本。

事实证明，新世纪以来，只有那些真切记录国家、民族崛起过程，以当代中国人鲜活的形象，容纳巨大社会变迁深广内容的作品，才能得到读者的青睐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江南三部曲》《这边风景》《繁花》《生命册》《黄雀记》，激荡着当代作家对时代课题的思索与解答，反映了作家艺术上贴近历史现实的追求，这些文学应该具备的天然气质与品格，在当今创作中日益得到重视。很多作家都在深入反思，拒绝对表象生活的浮泛描写，不愿在已有题材的小圈子里来回打转，对已有创作套路不倦重复保持

直面当下中国百姓的生存现实，抓住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，让时代课题在创作中得到最生动的呈现，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担当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。把握时代脉搏，承担历史使命，聆听时代声音，勇于回答时代课题，这便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。

作家不能缺失历史担当

时间是最伟大的批评家，上天垂青的天平更不会偏向那些思想内容苍白，疏离火热社会生活与历史大变迁的作品。万人空巷的电视剧《渴望》，小说畅销、电视剧热播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都一再启示着人们，优秀作品的出现绝非偶然，需要创作者心怀以自身利益更高远的志向，追求与大时代洪流的高度契合，或能够与社会进步产生共鸣共振，在艺术提炼上展现出非凡的才情与本领。时代在发展，读者的审美鉴赏水平在提高，当前不少作家注重深入群众生活，或到久违的乡村体验生活，或奔赴重大建设工程现场采访，把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心当成必修课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》《粮道》《毛乌素绿色传奇》《底色》等，聚焦当代热点问题，细致书写现实生活，反映了人们在历史洪流中的独特遭际，受到了好评。而非虚构作品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通过口述实录、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一个个具有时代典型性的农民人生故事，对农村、对土地上的人们的强烈爱与责任，以及对乡村、农民的理解与关怀，使之成为扣动人心的佳作。但不能打动人心，与受众所思所想不合拍的作品依然大量存在，几乎成为顽症，解决之路何在？

优秀作品的强烈震撼力，来自社会生活对作家的启示，是作家经过长期思考，对自己钟爱题材的热烈拥抱，是创作冲动压抑不住的喷发，是不得不说不得不写的冲动所造成的。没有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文学。托尔斯泰曾经提醒那些爱好写作的人们，永远不要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，即使有了构思，最终感觉到不是非写不可的，最好还是放下笔，放弃那个构思。现在有不少作品让人感觉到是没有生活激情、兴趣的写作，是惯性的写作，作家好像在自己的剩余素材后面顺水推舟，即使能表现出一些才气，终将缺乏力透纸背的掘进力。

如果作家没有因为创作而寝食难安，甚至像爱伦堡说的那样为此“害上病”，创作的作品激动不了自己，也

肯定激动不了读者，必被忘记，甚至使作者日后羞于提及。陈忠实写《白鹿原》，路遥写《人生》，首先出于难以压抑的激情，他们觉得不写就无法向自己交代，无法向后世交代。

贾平凹说陈忠实的难得在于他坚守大政治，“这种大政治就是类似张载的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是文学的大道”。路遥认为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，“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，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”。如果作家“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，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，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，也使自己失望”。他们的信念决定了自己的文学选择与担当。

时代呼唤现实主义精神

作家必须用自己炽热的心灵去感应世界，必须有所担当，但只这样也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在我们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大转型时代，日常生活、新闻信息提供给作家的，远比作家想象的更为多彩、芜杂、繁复，结局更出乎意料，有时连见多识广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。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，作家该如何处理题材，如何艺术升华，才是更大的考验。是照搬现实、模拟现实，还是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基础上，进行合理的艺术创造？是猎奇生活表象，图景式呈现庸常琐碎的生活碎片，还是去粗取精，化腐朽为神奇？最能显现出作家的功力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极花》得自作者10年前听到的伤心故事：一个在城里捡破烂的老乡的女儿被拐卖了，解救出来后却又留下纸条回到了被拐到的村子，西安城里电线杆子上被拐妇女的寻人启事依然没有减少，曾经为此激愤悲愤的贾平凹据此写了不少文字，但写了又推翻，总觉得不自在，怎么才能把这个题材写得得心应手呢？他问自己：“拿碗在瀑布下接水，能接得到吗？！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，什么都想尝尝，我也知道我的敏感，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，我就能闻出来，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。于是我得重新再写，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，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，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？”他不想学时下很时兴的“很狠的、很极端的叙述”的写法，而是选择了中国水墨画式的写法，有节制有收放，就像老

剪纸，“要逮住个东西的大势了，剪子就随心走”。作品以被拐女主人公胡蝶的有限视角，深入表现当今农村的困苦、农民的无奈与普遍的麻木愚昧，通过现实农村的贫富，农民内心世界的荒芜，对乡土社会积弊进行深入挖掘，妇女频频被拐，是因为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存在难解的困局，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。贾平凹深厚的生活积累，锐利的思想洞察，对社会问题艺术化的关注，是细腻入微、由表及里的，具有厚积薄发的力量。

文学要引导世道人心

杰出的作家从来就不是折中主义者，不是价值追求的骑墙派，在城市、乡村的剧烈变革中，文学的荣光属于那些能够立足当下现实，双耳紧贴现实、历史墙壁的人们，他们努力超越生活表象的志向，以形象的艺术图景引导人们向上向善，启示未来。刘庆邦的《黑白男女》，以几个死难矿工家庭及遗属的生活情感为主线，展现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的互相温暖、自强不息，动人的故事里有生活的辛酸，也有人性的温暖，更有命运的重压之下人性尊严的闪光，友情、忠贞、赤诚与奉献精神，作品产生了启迪心智、温暖人心的力量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中国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，这个“道”，说到底就是世道人心之理，就是有益于人类的思想价值、精神理念等。只要你强调，进而坚守这些能够让世界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、方法、途径及信念，世道就一定会好，人心就一定会归仁。周大新的长篇小说《曲终人在》以采访录的形式，从不同角度回顾已故省长欧阳万形的官场人生，反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，以期重新审视与激发社会良知良能，唤醒国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。这部作品告诉我们，只有官员不愿腐败还不够，全体国民都拒绝腐腐恨腐，社会风气才能好起来。周大新说，“官员的精神素质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百姓的追求；官员又来自民间，民间的精神取向其实也会影响到官员的追求”。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——假若有一天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你，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？文艺要能够凝聚民族向心力，引导世道人心。这是文艺创作的前提与出发点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。把握时代脉搏，承担历史使命，聆听时代声音，勇于回答时代课题，这便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。



文艺评论

一个陌生女孩儿的来信

□ 许宝健

做了30多年新闻工作，与读者互动是常有的事。但是，始终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20年前一个陌生女孩儿的来信。

那时我在经济日报做农村报道。1996年12月的一天，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。信封是非常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有当时经济日报的地址和我的名字。字是用圆珠笔写的，非常工整。信封的下面，清晰地写了寄信人的地址，“河南省××乡××大队××学校”。从黑色的邮戳上可以看出，这个学校位于“河南新蔡”。信的开头写道：

“尊敬的许叔叔：当您看到这封信时，也许觉得有点奇怪。我是一位农村的女孩，由于平时爱看报，在《经济日报》上得知您的大名，故提笔致信于您，请恕小女不才。”

紧接着，她向我反映了一些问题，都是当时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比如计划生育，她说他们那里超过18岁的都要孕检，她认为是很荒唐的。还说有些人用钱买准生证，继续生育子女，道逼法外。

她继续反映当地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。比如，乡政府向农民要钱，平均每人45至50元的芝麻任务，每户55元的宅基住房费。她还说当年秋收不好，化肥、种子、农药等又涨价，农民的日子不好过。更可气的是，当地采取各种强迫手段向农民收钱。

学校又怎么样呢？她接着写道：“教师发不下米工资，教导主任拿工资做生意，发大财，发大款。”

她继续写道：“如上机（级）来查检（检查），村委主任用命令让农民群众讲假话，若要说实话加倍罚款，牵牛扒房。”

信的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：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决不让他们这样为非做官。希望引起您的重视，前来调查、核实，为农民做一件好事。

许叔叔，您的看法呢？我知道您很忙，不该打扰您，若不能前来采访，望给个明确的回信，一（以）免心挂，坐立不安。”

回想起来，我可能的确让她失望了。我没有去调查采访，只是给她写了一封回信。然而，即使是回信，也是在拖了很久才提笔的。印象当中信的意思是：这些事情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存在，要正确看待这些问题。你还是个在校学生，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等等。字里行间，隐含着这样的意思：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

很快，我又收到了她的回信。她说，看了我的回信很激动，一连看了好几遍。不过，她告诉我，信不是她直接收到的，而是有一天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，把她说了一顿，而后递给她的。递给她的时候，信是打开的，显然是校长看过了。

她不解，她在信中告诉我，她很生气，怎么也想不到校长不尊重别人的人格，随意偷看别人的信件。但是她说，她不能表现出来，只是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，就退出来了。

这封来信，比第一封长了很多。正是在这封来信中，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：

“我们现在是五年级，学习成绩还可以，我有时看书、看报刊，把一些有哲理性的东西都记录下来，不管什么书籍，只要对学习有帮助，我都会认真去读。可惜的是，妈妈怕影响我的身体，不让我看到深夜，总是干扰我，我也知道妈妈是心疼我。我爸爸外出打工去了，我与妈妈相依为命……有时我捡些破报纸看后也会保存起来。”

在这封信中，我读到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思考：

“面对现在的不法行为不可计数，单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，要让全民族的人共同努力，祖国的前程才会更光明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

在这封信中，我看到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行动：

“我也告诉您：去年的时候，我偷偷地写了几封信分别投寄到电视台、调查组等（这些连父母都不知道），结果上级来人调查，把那些做官的吓得面如土色，胆战心惊；而我却暗自高兴，希望为民减轻负担。”

看到这里，我用力想象着这个反腐小英雄的模样。与第一封信沉重的调子相比，在这封信中，她也用光明和希望的眼睛看世界：

“许叔叔，我真心地欢迎您来家乡采访，我们学校新建了教学楼，马路边有新建的养鸡场。我们家乡有许多新鲜的事写，真可惜我的水平有限，不能发表罢了。虽说我家很穷，我们会待您像亲人一样，使你感觉到民间的亲情，农民的平凡、伟大，乡村的魅力、可爱。”

她还在信中表态说，她一定加倍努力，考出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向我报喜。

信的最后，她还用括号括起来写了一句话：“叔叔，您写信忘记写日期了。”

从几封信的文字来看，虽有个别的错字病句等，但按照农村小学五年级小学生水平来要求，她的作文水平是不低的，这肯定得益于她平时热爱阅读。

此后，断断续续，依然有信往来。记得在一封信中她告诉我，她取得了全乡五年级第二名的成绩，但很遗憾没能考第一名，请我谅解，并表示会继续努力。

不久，我们的通信中断了。一晃，20年过去了。她的来信我一直保存着，也常常想起写信的陌生小女孩儿，猜测着这些年来她可能的状况。

电影：要市场繁荣，也要创作高峰

□ 陆绍阳

当前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，可以说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是，从产业发展角度看，中国电影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，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，用票房、制片数量与新建影院等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衡量，都处于历史最好阶段。忧的是，从出精品的角度来评判，还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。

回望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发展路径，它实际上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假设基础上，先把市场做大，再解决其他的问题，可以称之为“做大蛋糕论”，认为市场做大了，那么更多的投资人就会觉得这里有前景，有市场也就有“钱景”，资本就会自然跟进；只要市场足够大，电影多样化的局面就会形成，小成本电影的放映空间、艺术院线的建立，这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确实，在做大市场这一点上，经过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的努力，我们做到了，同全面实施产业化政策以前的2002年的10亿元票房收入相比，在短短的15年之间，年票房收入已经翻了将近50倍，发展速度可谓惊人！

但为什么电影多样化，以及创作高峰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出现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以先探究一下产业勃兴的原因。从产业环境改善的角度看，它得益于对基础建设的重视，包括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支持。从创作本身看，商业片成为主体。理论上，只有满足大多数人的观赏趣味，电影才可以得到商业上的回报和成功。因此，类型化的商业片生产得到制片方的青睐，类型片是被市场证明成功的片种，依赖的法宝是模式化，它在内容上就需要迎合人性中最基本的，也就是动物性的偏好，直接一点说，媚俗是它的天性。但如果市场被类型片一统天下，实际上钳制了电影的多样化发展，因为类型电影在题材、内容、样式上追求的是趋同性，忌憚表达和观念上的先锋性，这也是电影市场上虽然数量很多，但都是相似度很高的电影的原因。从商业角度考量，拍类型片无疑是最保险的，也是最保守的一个选项，但它在形成一种制片惯性后，创作者主动创新的愿望就会衰退，即便有突破，也大多是在类型片的框架内进行。因此，原先的预期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照假设的轨道行

进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当然，有人会提出，现在只是产业的成长阶段，可以再等等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，这种出发点是美好的，但那样的局面真的会出现吗？主观愿望是一方面，客观实际又是另一方面，有时候，事物的发展并不会朝你的意愿推进，甚至有可能朝反方向发展。

如果我们仍然照此路径前行，可以预见，电影业的面貌不会有质的改观，原因有两点：第一，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变；第二，一旦观众养成了某种口味，短时间内就很难改变。因此，这种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路径，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，其实是不可靠的，甚至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，导致文化产品越来越单一，品位降低，创作者的创新动力不足。

文化的问题不是光靠产业思维 and 手段能够解决的，电影能给人提供精神放松、娱乐的功能，这是它的一大优势，但不能因此而模糊了它作为文化的本来面目，文化之所以有无穷的魅力，是因为它能够涵养心灵，抚慰人心，提升民众的整体审美水平！尽管中国电影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中，步履艰难，但20世纪的中国杰出

艺术家一直在执着地探索一条电影的民族化道路，不甘做好莱坞第二，像《神女》《马路天使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小城之春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早春二月》《天云山传奇》《芙蓉镇》《黄土地》《秋菊打官司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这些真正“留得下”的作品，都因为对现实的诚实介入、抒情传统的承继、富有“灵韵”的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特有魅力。可以说，这些美好的电影有效改变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，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，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！我们不但不能中断这种探索，而且要接续它，把现实中的中国人故事化为人物的银幕形象，把对中国文化品质的探寻内化为创作者的内在冲动！

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只盯着数据的增长，文化活动更要有文化自觉意识，尤其对拥有文化领导权的管理者来说，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的任务，就是在确保市场繁荣的同时，建立起更长效的机制，实施更有力的措施，构建起真正多样化、多类型、多品种的创作格局！



影视观察

